

經濟建設與經濟改革

李稼蓬

JIAO LING YU JINGJI GAI GE

安徽人民出版社



经济建设与经济改革

李稼蓬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骆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6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1000

ISBN7—212—00443—X/F·81 定价：3.80元

序

杨永良

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了推进这一宏伟而又艰巨的事业，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雄辩的事实证明，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路线，我们就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旺盛的生命力，应该通过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体现出来。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绝对不能动摇。如何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把经济工作中心真正转到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效益提高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目前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只要我们牢固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就一定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的经济体制

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改革性质的科学理解。自觉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认清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决不是要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变成它们的附庸。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要改掉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生机和活力的僵化了的东西，把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的改革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的要求，并且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平稳地、健康地推进，从而不断解放生产力。十年改革，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只要我们坚定地贯彻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断的探索、开拓，我们的事业将越来越兴旺发达。

稼蓆同志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一书，认真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实，总结实践经验，探索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我觉得这种努力是可贵的。这种面向现实，自觉地用理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提倡。我希望我们的理论界的同志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也更关心学习和钻研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使我们理论的繁荣和事业的发展更好地相互推动、互相促进。

1990年7月4日

目 录

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	(1)
——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不能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原则	(7)
——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充分重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14)
——读《陈云同志文稿》	
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看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25)
试论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	(34)
从我国国情出发组织社会主义再生产	(43)
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建设速度问题	(54)
割掉经济关系中的封建主义“尾巴”	(69)
改革的阻力和历史的惰性	(80)
牢固地树立商品经济的观念	(87)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	(93)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观念变革	(103)
谈谈价格体系的改革	(112)
关于横向经济联合问题的思考	(116)
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正确处理企业自主权问题	(124)
千百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132)
——安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	

包干到户是农村生产关系前进性的变革	(170)
农村专业户的地位作用与发展前景	(176)
农村自营专业户研究	(182)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	(19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若干理论问题	(200)
科学地比较两种社会制度	(213)
后记	(221)

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

——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方面，《论十大关系》是最早研究这个课题的一部科学论著。在这部论著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他还提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正确方针。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一再偏离和违反这些方针，正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

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根本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协调，是很有迫切意义的。这也是对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纠正。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经济水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水平愈低，对本国的农业依赖程度就愈大。这

就决定了农业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约束力。我国人口众多，吃饭问题大，一年需要量就是几千亿斤粮食，如果向国外买，既买不到，也买不起。底子穷，经济不发达，人民大部分生活资料、轻工业大部分原料、国家大部分积累，都直接、间接依靠农业提供。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

轻工业在我国的位置仅次于农业。轻工业有许多优点：它容纳的劳动力多，同样固定资金可以安排的就业人口为重工业的3倍；它消耗的能源少，每万元产值耗电只有重工业的 $1/3$ ，耗煤只有 $1/5$ ；它建设的周期短，一般只为重工业的 $1/7$ ；它提供的盈利多，通常为重工业的8倍。世界上许多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一般都是在先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业，然后再促进和推动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的国家，更需要多安排点轻工业。

当然，重工业也是不可忽视的。它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离开了重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就不能完成，四个现代化就不能实现。问题是，在一段时期，我们的重工业发展得太突出了，弄得整个经济结构畸形，影响人民生活改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是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些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思想，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运动本来的辩证法。

二

关于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安排国内生产布局的问题。在《论十大关

系》中，毛泽东同志从战略高度提出的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要“大大发展”原有重工业、轻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等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我国的工业解放前70%集中在沿海，这种畸形状况，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因此，“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但是，“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历史悠久，基础较好，技术力量较强，同时轻工业较多，资金积累较快。如果是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就当前来说，我国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工业城市，一方面应该放开些执行以进养出的政策，发挥优势，逐步加大进口原料、零配件加工装配后出口的比重，多生产些高精尖产品，为国家多创外汇，与内地作合理的分工；另方面又应该通过技术扩散、技术转让、技术输出、知识输出、人才输出等方式，大力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

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一定要考虑到战备的需要，这是对的。但是，不可片面地突出国防建设。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搞国防建设要依赖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国防建设的水平取决于经济建设的水平。多年来，我国的国防工业、国防建设和国家工农建设有脱节现象，带来很多弊病。

三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涉及的是如何调动上上下下四个方面积极性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和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也是完全

符合中国国情的。

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国情的要求。而要做好这一点，最基本的就是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国有十亿人口，人民必须有吃有穿，国家大局才稳定。国家越是穷，越是要考虑积累率不能过高。如果挖了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去搞建设，就会把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挖掉了。那么，怎样合理地确定积累率？这就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一般说来，积累的最高极限是国民收入减去全国人口原来的消费额，就是说不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积累的最低极限是新增就业劳动力所需的平均资金装备量。要在这两条界限之间寻找积累和消费的最佳比例。通常，在国民收入增长得快的情况下，可以多留一点积累，反之就要少留。总之，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同志所一再指出的那样，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增加集体福利，要“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不增不减”。今后，我们再也不能走我国曾经长期走过的那条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也是一对矛盾，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就“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的来看，凡是对于国民经济有全局影响和战略意义的大事，必须由中央掌握，做到全国一盘棋，“同舟共济”；而在非全局性的问题上，则应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许多好处：它可以发挥各地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它可以做到让地方为中央分忧，让中央集中精力抓大事。最近两年经济改革的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

为了把国外的积极因素也调动起来，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这个口号，论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

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建设事业。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我们这个国家是从来不会在任何大国、强国、富国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敢于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独立自主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争取外援，向外国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学习外国不仅不会妨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反，只会加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认真向外国学习，能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看到差距，从而激励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认真向外国学习，能帮助我们增强自力更生的力量，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的实行。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清理了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

影响，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只要认真执行这些方针，就会象攀登泰山玉皇顶一样，勇敢地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十八盘”，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一九八一年七月）

不能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原则

——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才能理解和掌握。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仍然需要深入研究和认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事实正是这样。正因为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才揭示了整个社会发展（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长期被唯心主义理论家们弄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自己的学说时，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就明确地把19世纪欧洲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作为必要的前提。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生产力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1956年，党的八大规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后来产生了曲折，一个时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也给林彪“四人帮”搞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主义以可乘之机。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党的十二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作过全面的阐述，特别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阐述得最多、最深刻的正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蒂，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我国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力，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等等。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基本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具备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本质特征，但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雄厚，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犹如列宁当年对建国不久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所说的那样，还不能算“完全”或“完备”的社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情，是当前我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也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多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的标准问题不大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不重视，常常离开了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生产关系变革上，很多“左”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没有注意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必须有若干限制；没有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形式；没有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与之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外有些评论家说中国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另一些评论家说中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发表后一种见解的评论家是很有眼光的。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把改革、开放、搞活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干资本主义”，怀疑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错误的。

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是我们选择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标准，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可以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从而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现实公有制的某些体制和管理形式不能体现这个基本特征，它就是应该加以改革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作用，分配上搞两个“大锅饭”，企业缺少自主权，职工不能实行民主管理。这套体制不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非改革不可。至于公有制主体之外的多种经济形式，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力不可缺少的补充。适当地加以发展，有利于促进公有制主体的健壮，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广义来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纵观历史，近代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闭关自守。横看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近年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充分利用了国际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①“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 + =总和=社会主义。”^②斯大林也说过：苏联有大约 2/3 的大型工业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其余 1/3 是利用德、法、英、意、日等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进步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做得太少而需要加紧去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8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改革亟待深化。由于我国人民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对改革的必要性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也决不可低估改革的阻力。从长时期看，阻力主要来自习惯势力，来自“左”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要十分注意随时排除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在当前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的形势下，主要还是克服来自“左”的阻力。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页。

②《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